



聚焦垃圾分类新规系列报道

又到六点半,迎着晚霞,穿着印有垃圾分类宣传语的“绿马甲”,韩阿姨准时走到自己值班的“垃圾桶站”,开始了今日晚间1小时的值班。这样早晚各一次的社区垃圾分类宣传志愿者值班,韩阿姨已经坚持了16天。

“这不北京开始实施垃圾分类新规了,我们得宣传指导呀。”像韩阿姨这样的志愿者,在北京东城区东花市南里社区共有51名。在这个拥有4000多名居民的小区里,志愿者的数量可不算少。

“每个垃圾桶站旁,都有一名志愿者。”垃圾分类志愿者、东花市南里社区党委第一书记马战友告诉记者,由于小区很早就开始探索宣传垃圾分类,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如今新规之后,“成效更明显了,我们看到,真正行动起来居民越来越多了。”



北京东花市南里党员带动群众,“达人”带动众人

垃圾分类的社区样本

◆ 本报记者张黎

结合小区实际,“两桶一袋”最方便

3号楼的白奶奶,正拿着自己分好的两袋垃圾走下楼。

“一袋是其他垃圾,一袋是厨余垃圾,我们就老两口,产生的垃圾本来就不多。”白奶奶熟练地把垃圾扔在了楼门前对应的垃圾桶里。“我觉得分类不麻烦呀,习惯了就适应了。再说,你看就这两类,有什么费劲的。”

此时记者才留意到,在小区里设置的桶站为3个一组,其中两个灰色桶注明“其他垃圾”,一个绿色桶对应的是“厨余垃圾”。

垃圾分类宣传不是分四类吗?为何在这个小区里,只见到两种分类?马战友随即给出了解答,“按这种方法分类,是目前实行起来最方便的,也完全能够满足小区需求。”

“居民操作起来简单方便,分类的意愿才能提升。”对于纸箱、塑料瓶等可回收垃圾,居民可以顺手带下楼,放在桶旁边,小区有专门的资源回收人员会及时拿走。

记者了解到,这样的“两桶一袋”方式,也是北京市倡导的垃圾分类方式。如今,市城市管理委已经制定了《居民家庭生活垃圾分类(两桶一袋)指引》,建议居民在家中设置“两桶一袋”,分类收集垃圾。

而对于“有害垃圾”红色桶,则没有在小区内摆放。“一方面是量少,一方面也是里面的物品不安全。”马战友说,为避免产生隐患,他们把红色桶放置在社区居委会门口,“居民多走几步,扔到这里集中收集处理。”

居民把“有害垃圾”扔到红色桶,仅仅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对于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来说,则要想得更细、更全面。“比如有些过期药品,社区工作者都重新拿出来,把药片碾碎,防止再利用,这样的闭环管理,才真正做到安全。”

垃圾分类中,志愿者的工作不容忽视。这些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党委带领下的

社区党员,通过党员带动群众,分类“达人”带动众人,垃圾分类的示范效应显著。

在马战友看来,要想真正动员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社区必须结合本小区实际开展具体工作,“要有调研,要动脑筋,还要细心细致地指导居民,里面的学问多着呢。”

引入专业化公司,社区和居民双受益

值班了半个多月,志愿者韩阿姨告诉记者,“我感觉参与分类的人多了。你别说,变化挺明显的。”

变化明显,有政策的推动,可背后的“功夫”,却不是一天练成的。

东花市南里社区党委书记杨立新向记者介绍,与“垃圾”打交道,俨然成为了社区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年来,社区积极实践行动,如组织居民参观垃圾焚烧厂、学习使用垃圾分类APP打卡、在属地中小学推广“我给垃圾记个账”等活动,通过政府引导、知识宣传、智能化管理等多种手段,培养市民垃圾分类的意识和习惯。

杨书记介绍说,北京市施行垃圾分类新规以来,他们更是多次召集社区各党支部书记、志愿者、物业等部门,针对垃圾分类开展研讨,吸取好经验、好做法。

她还不忘向记者展示她的手机微信群——“你看,昨天还有热心居民在分享一个垃圾分类的小游戏,这说明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参与的积极性也在逐步提升。”

走在东花市南里社区,只见桶站干净整洁,旁边树立的宣传板上,公示着当月厨余垃圾的回收量。谁来回收这些厨余垃圾?小区又是如何保证桶站清洁如新呢?

原来,社区在2017年就引进专业企业北京天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参与垃圾分类体系的建设和运行。

公司负责东花市南里片区的工作人员马瑞介绍说,他们在小区内设有专门的垃圾分拣员,每天会定时定点清运垃圾。这些厨余垃圾,会运送到社区垃圾中转站,再

由环卫集团统一运输走。“目前公司在东城区覆盖了5个街道,大约30余个社区。从事垃圾分类的一线人员,也有100多人。”

针对可回收垃圾,天天洁公司在小区门外设立了封闭的铁皮白房子——“绿猫”回收屋,专门收集纸箱、塑料瓶等可回收资源。

“绿猫”还有专门的APP,一键预约,小区内外的分拣员就会上门,“报纸每公斤1.4元,纸板每公斤0.7元”,在APP里,不仅能回收纸类、塑料类、金属类物品,如电视、空调、洗衣机等大件电器,也可以上门回收。

引入专业化队伍,无疑对社区垃圾分类工作起到了助推作用。“一方面,企业协助政府解决垃圾分类,社区提高了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居民获得了良好的社区环境,一举多得。”杨立新表示。

“五一”之后,厨余垃圾的量大了,原来一天早晚各一次,现在有的小区要收四五次,居民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了。”马瑞如是说。

调动公众参与,长期坚持还需费心巧思

记者守候在东花市南里社区的垃圾桶旁,见到了“全副武装”的“绿猫”垃圾分类员张师傅。此刻,他在把桶里的垃圾分拣出来——厨余垃圾要“破袋”,倾倒在工具车的桶中,垃圾袋则放入“其他垃圾”桶。

桶内收拾完毕,还有一系列后续动作,要把桶里外擦干净后,再喷上消毒液。“每一个桶都要这样做,”张师傅说,“如果你在‘绿猫’APP里预约,上门回收的也是我。”

“对我们来说,居民分类习惯越好,工作就越轻松。”张师傅也表示出了和其他采访对象一致的印象,那就是垃圾分类情况在好转,分得人“多了起来”。

在小区的采访中,也有居民表达了自己的困惑。“都直接倒在桶里,夏天多不卫生呀,恐怕会有异味吧。”

“听说今后厨余垃圾要自己‘破袋’,这样会不会弄脏手呀。”上班族潘先生说。

对此,马瑞告诉记者,正确且规范的操作,应该是居民自己把厨余垃圾“裸投”。

“人性化”条例要配“无折扣”执行

规定为每个居民义务的情况下,已经显得不够。

因此,建议北京市找一些社区尝试撤桶并站,建立全民分类的设施条件。而且很重要的,把各小区所有分类点位用明显标识牌告诉居民,这也是全民分类新时代最基本的宣传。

党建引领,带动各方积极参与

中国环境报:采访时,有小区物业反映,生活垃圾分类管理难、督促难,管得松了可能会被追究,管得严了容易引发和居民间的矛盾。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谢新源:小区垃圾分类工作包括硬件改造、居民动员、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的具体操作等,这些工作必须配合起来,才能出效果。但是,目前在北京市的小区中,这些职责是由不同主体承担的,而且不同小区(如有物业小区和无物业小区)的情况差别很大。

北京市此前垃圾分类主要交给第三方企业,但后者是社区的外来者,做厨余站点管理、二次分拣问题不大,但并不适合当面进行居民动员工作。同样,物业虽然是“生活垃圾管理责任人”,但由于居民对其认知是“为业主服务”,因此,物业来督导居民垃圾投放行为,存在难度。

我建议,以党建引领,带动居委会、物业、垃圾分类公司等小区相关方。上海、厦门是国内垃圾分类实践最成功的两个城市,它们的一条共同经验就是,社区党建引领,通过垃圾分类工作会议和实地推动的磨合,确定各方的职责分工;居委会在居民动员方面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并督导物业等法定责任方做好硬件和管理制度建设,直到分类效果达到高位维持的阶段,再交给法定责任方;而居委会本身也受考核制度的约束。

另外,建议北京市重视和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一些

社会组织在环保方面专业性强,可以协助相关方进行社区垃圾分类动员整体方案的设计和跟进。而社会组织来自民间,对居民更有亲和力,可以成为政府、物业、垃圾分类企业等相关方与居民沟通的“润滑剂”。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加强媒体监督

中国环境报:您认为,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开展动员,让更多市民参与到垃圾分类行动中?

谢新源:一方面是建立精细化的管理制度,让基层宣传动员更有章法。北京市前几轮垃圾分类的一个问题在于过于粗放,宣传动员与制度的配合不够。例如宣传往往仅靠广场活动、讲座,参与者也往往是同一批人,达不到全民动员的态势。

据我们的调研,厦门市通过台账记录,利用大数据掌握每户居民是否已经养成分类习惯,并且与入户动员精准结合,只对尚未养成习惯的居民进行上门沟通,随着分类的居民越来越多,动员成本也越来越低。

另外,垃圾分类一线动员,需要督导员、志愿者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沟通技巧,社会组织可以对他们进行培训,并解决后续实操中实时遇到的问题,直至大部分居民养成自己动手分类的习惯。

另一方面,要坚决执法,由媒体跟进报道。北京市垃圾分类新条例最大亮点在于明确规定了从垃圾产生源头到后端处理一系列相关主体的责任。那么对于未履行义务者,就应当严格执法。上海市除了正面引导外,去年7月1日之后的一周内,全市城管开展了集中的执法工作,并且通过媒体全程直播,发文至各个新闻平台。让社会看到条例实施后的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改变少数不分类者带来的不良影响,形成全民分类的氛围。

“益”起来

办公新风向

8小时的绿色实践

◆ 本报见习记者肖琪

上班的一天,从早晨的打卡开始。“我一天待在办公室的时间比家里多。”互联网从业者田惠说,“如果办公环境能更加绿色,那我这个‘社畜’的‘搬砖’体验将会得到极大改善。”

员工有需求,社会在呼吁。今年地球日,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万科公益基金会与多家合作伙伴共同发起倡议,以“绿色办公”的方式,鼓励公众、企业在办公场景作出更环境友好的行为选择。

“破圈”,从环保组织呼吁到企业直接参与

如何理解“绿色办公”?在自然之友零废弃顾问吴晓看来,“绿色办公”并不仅仅是在鼓励一种以节俭为核心的行动方式,而是减少碳排放,为办公场景更可持续的资源和能源利用而努力。

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一梅则认为,“绿色办公”应该涵盖从建筑材料、办公室设计、办公采购的节能与生态友好,到办公人员日常行为方式的绿色选择。

因此,办公室的能源管理和资源管理十分重要。“水、电、采光、隔热层等整体的生态设计使用‘绿色能源’,办公室的装修布置、物品采购和办公消耗,可以尽量不使用一次性用品。”陈一梅说。

如何让更多企业参与到“绿色办公”的行动中来,则至关重要。

没想到,此次“绿色办公”的倡议发出后,很短时间就得到了万科公益基金会、字节跳动公益、浦发银行、中新天津生态城、腾讯公益、乐利中国等十几家单位的响应。

这让吴晓有些开心,“这意味着,我们的‘破圈’尝试很有效果。”

“以往环保NGO组织活动,大多在圈子内部传播,一翻朋友圈就能发现被刷屏了。这固然是好事,但却无法有效吸引参与主体,实现良好的可持续效果。”吴晓说。

“这次‘绿色办公’的参与者以企业为主,一家企业做得有效果,别的企业会被吸引,就能达到很好的传播示范效应。”吴晓说,“我们希望利用最少的资源实现最大化的影响,通过企业参与,达到宣传环保理念的理想效果。”

化身辅导老师,给予企业专业指导

推进“绿色办公”理念与行动,实实在在的执行力最具说服力。为此,此次倡议行动中,自然之友与万科基金会等合作伙伴还扮演了“老师”的角色,对每一家参与的企业进行充分调研、试验和总结,帮助企业了解各个阶段对“绿色办公”的需求,在环节和细节上给予更专业化的指导。

“我们类似于辅导机构,手把手地辅导企业实施‘绿色办公’。”吴晓打了个比方说。比如,在供应商采购环节,我们会帮助企业与专业的评估公司建立联系,对废弃物管理进行认证。再比如,协助企业设计宣传展示区,让“绿色办公”的文化氛围在其内部生根发芽。“包括宣传手册内容如何确定,食堂内的电子显示屏播放什么内容,都有针对性的建议。”吴晓介绍说。

很多企业“在绿色办公”实践中一点点进步,在“绿色办公”倡议的响应下,万科公益基金会公布了集团“零废弃办公计划”的阶段性成果:集团总部有53家单位参与到零废弃办公行动中,垃圾减量率达到79%,垃圾分类正确率为88%,累计消灭厨余9049千克。

陈一梅告诉记者,为了推行整个计划,总部进行了员工垃圾分类认知的调研,建立垃圾处理流程及终端渠道,还对设备进行更新。

零废弃行动,人人可参与

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参与“绿色办公”,为办公室零废弃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万科公益基金会推出了“零废弃办公手册”,自然之友绿色办公指导手册也给出了很多建议。

比如,手中的电子设备充满电时,及时拔掉电源;带着自己漂亮的水杯来上班;打印没有格式要求的文件,开始使用单面废纸。连人们容易忽视的差旅场景,手册也给出了建议,比如长途差旅时优先选择火车,外出酒店可以自备洗漱用品和拖鞋等。

在强烈的氛围下,田惠参与了手册中的“10件刷绿办公挑战”。“我觉得挑战没有那么难,观念的转变在潜移默化中。”田惠说。

为了让“绿色办公”制度化、长期化,自然之友还将持续开发绿色办公标准,并参与相关认证的编制工作。吴晓介绍,“我们希望能与企业联手打造更多成功案例,为相关行业与整个社会树立绿色典范。”

CEN 专访

■ 对话人 零废弃联盟政策主任谢新源

■ 采访人 本报记者陈妍凌

不撤桶并站考验公民行动自觉

中国环境报:北京市垃圾分类新条例对违反规定的个人和单位的罚则引发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人性化”的体现,有人认为是“条例不够硬”,您如何解读?

谢新源:根据北京市垃圾分类新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对再次违反规定的个人,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但自愿参加生活垃圾分类等社区服务活动的,不予行政处罚。我认为,这是北京市这项措施显得更“人性化”的地方。罚款不是目的,目的在于让少数没有分类的人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从而转化为行动。

另外,新条例规定,垃圾收运单位发现收到的生活垃圾不符合分类标准的,有权要求管理责任人改正;拒不改正的,应报告城管执法部门。

我理解这是“不分类,可劝改”,区别于上海等城市的“不分类,不收运”,使得北京市新条例相对弹性更大。但如果收运单位和城管部门执行到位,也可以起到倒逼源头分类的效果。

中国环境报:北京垃圾分类“不会撤桶撤站,也不强迫定时定点”,这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

谢新源:前几年,北京市尝试过动员居民志愿者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源头督导,却没有同步采取撤桶措施,志愿者们无法兼顾多组垃圾桶,与扔垃圾的居民难以有效沟通。后来,一些小区设立了“厨余小屋”,可以保障愿意分类的居民的厨余垃圾有出口。但是,大部分这样的小区并没有标识牌指示这些“厨余小屋”的位置以及开放时间,加上原来的桶没有撤销,让很多居民误认为小区没有进行分类。而且仅靠小部分居民自愿分类,在新条例将垃圾分类